

鹤坪笔下的老东西

□冯骥才

鹤坪我见过三次。我从未造访过西安,故而都是他来瞧我。在我每天往来匆匆的客人中,鹤坪却让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个子小,瘦硬爽健,说话热气扑人。年岁不大,人挺老到,却不精熟。还有几分侠义劲儿,倒是对我的胃口。他每次来,总带点老东西。好像老东西是陕西的土特产。一个黑黑的陶罐,一件木人,一块瓦;虽然都是半残,带泥带土,但年代足够,绝非当今各地古董市场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假货。由此我看出了他有挺不错的眼力,能识别出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凭的绝不只是眼睛。我最怕人家把假古董当做宝贝硬送给我。但鹤坪捎来的这些老东西,却一直摆在我桌上。

到了“通”和“适”这儿,俗开始呼吸了。

不论“通俗”还是“适俗”,都首先是生存的技术,其次“通”和“适”显然与审美有关。

俗就是了,没有文野之分、雅郑之辩,俗是私事。切入了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到:惟有俗才是真正“关心”与“写生”的人生艺术。

好的小说就像自家院子里不打眼处窝着的那一老瓮腌酸菜。老瓮虽说灰头土脸甚至蒙尘藏垢,但这一瓮酸菜远比美国历史悠久。隔些日子,你总会想起老瓮和瓮里的腌酸菜。每次,当你接底子翻搅起老瓮里的腌酸菜,瓮底早已沉积许久的那股子气浪咕嘟咕嘟地释放出本真本分的“自家”的气味;这气味或隐或现或酷辣刚暴,顷刻使你产生种种复杂的联想。打开腌酸菜的老瓮,很容易沁入时间的深流,任“气味”或者“味气”绑架你挣脱浮华与骄奢的欲望峡谷,进入大众生活、俗世生活本清则静、本真则正的“原生原发”的境界。

然后,你就不响不响地把“镇缸石”(压在腌菜上面的一块石头)压在酸菜上面,并且用瓦盆做瓮盖,扣上老瓮,那股子令你透彻肌骨、灵魂出窍的气味和味气还在屋子里弥漫,并且破门而出,穿街巷越飘越远。气味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覆盖”理智与思考;气味具有极强的渗入作用,调动情绪与感觉,直达心肺。气味也是任何艺术最撩人的“密钥”之所在,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气味神乎其技!

到了老西安土语这儿,气味仅仅只指常规常识的物质气息,而把通心透窍或者撩人魂魄的气味一概地称为“味气”!

老西安人说的“味气”,“气”字要轻读,是“味气”而不是“气味”,其中包含德性、神采、味道、韵味等诸多方面。

小说往直白里写,像“炒葱花”那样简单。

“炒葱花”的主角就是青葱一苗、油盐少许。关键在于火候。火候就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或徐或疾,要恰到好处!

炒葱花用急火烹饪,所谓炝锅。炝锅之下,葱花在热油锅里翻个身就得起锅。然后,油香裹着青葱的暗香,急火攻击出的油盐的隐香,荡漾开来——好的小说,你读就是了,评论它干什么!写什么,怎么写还有为什么写,这是三个问题。

别老惦着把小说写成“国宴”,更别惦着

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这次鹤坪来天津,把他的《俗门俗事》书稿给我,请我写序。我看过便笑了。原来他写在纸上的也是这些西安的老东西!肯定他认为我一准识货。

鹤坪写得蛮好。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我不懂得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我是从细节和语言的独特性来考察这些生活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

有两种小说:一种小说故事是真的,但材料是造的,就像当今旅游化的“名人故居”——房子是真的,里边的东西全是真的;还有一种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里边

的材料全是硬邦邦的,真格的。这便可以借尸还魂,硬叫画上人走下来。

可是材料若要地道,并非易事。作家的功夫一半是在手里边的材料上。作家手里的材料不同于泥瓦匠手里的“沙子灰儿”,这些材料都是作家使用非凡的眼力从生活中“瞧”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鹤坪这本《俗门俗事》的价值了。提到价值,还有一层,便是文化的价值。

如今中国人也许还没弄明白,几千年来,只有当下的生活才称得上“巨变”。连“文革”之变,也变不过今天,其原因便是农耕文明的瓦解。于是在这昔日文明框架里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在迅疾变化。留之不得,挽之不住,失之无痕,去不再来。

于是,作家要干的一件事,便是将昨日的形态记录下来。当代作家也许是农耕文明最后一代的经历者,我辈不去做,后者做不得。就像本书中的老城、老宅、老人首、老手艺,鹤坪不写,谁人能知?因故,鹤坪的文学创作便有了记录文化的意义,在这层意义上,这本《俗门俗事》比起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大窑门》则是十分自觉的。此亦可称作“文化的自觉”。

于是,鹤坪这本书自然就超越了市场上那些“民间传奇”。民间的事物和人物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但这种神奇的魅力不是在鬼狐、巫术、野合与秘方里,而是在实在又鲜活的民俗生活之中——包括这些老人首的“门道”里。那就要看作家有没有双脚真的踏进民间,有没有真切的民间情感。我相信鹤坪的两只脚是踏入民间的。因为书里书外的这些“老东西”,不假不虚,全靠得住。

鹤坪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属于陕西,应该说他是行走无羁的。



鹤坪小说《俗门俗事》评论

鹤坪的文章看得多,在西安的报纸上几乎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他的文章。西安人庆幸鹤坪的出现,我庆幸他的成功。

鹤坪是西安的老户,曾经和我住在一条叫大车家巷的巷里。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他时常携着他的诗稿来我家给我念,一口纯正的西安话,激情充沛。我为他的才华叫好,却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怕冷,耳朵上要戴毛线织的耳套,手上是一双手套,但十个指头却裸露着,是那个年代劳动人民特有的手套。大车家巷里有一位身体残疾的小儿科医生,医术不错,我常领孩子去求医,不止一次见到鹤坪在巷中与卖糕点的吹糖人的人闲聊,或者用自制的安有铁轮的小木板去拉,响声刺耳,水滴淋漓,甚至见他在那巷口唯一的公厕排队等候出恭时与人争执“闲人”一词产生的渊源。后来,我搬出了那条巷子,与鹤坪见面的机会少了,似乎很多年月未在报刊上读到他的诗作,听说去下海了,听说去了云南去了四川,听说做书商没有发财开饭馆没有赚钱又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终是在一个午后,他突然在敲我家的门,胳膊下夹着一部书稿让我读的。我已经很惋惜他停止了写诗,但我也知道他的秉性里有“散人”的质地,浪荡了这么多年,还真能写什么小说?待他走后,我读那部书稿,这就是《大窑门》,竟使我读得很有兴趣,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作家出版社。第一部小说的成功,给西安文坛一阵惊喜,也给了他莫大的激励,小说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他是一名自在的职业作家,大车家巷的民居业已改造,谁也不知道他搬去哪儿去住了,又在什么地方烟腾雾罩地作他的小说,但许多朋友都在说他们在某街某巷看到过鹤坪了,瘦瘦小小,扑克邋遢,一肩低一肩高,跳跃着步子在城里游走。我笑了,这是鹤坪最悠闲的生活状态和最自在的文人状态,他无所不能地熟知着这个城市,认识着这个城市,或许正在孕育着关于这个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相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在文学上是特点逊色的城市,多少年里,我们一直在鼓吹为这个城市写作,写出这个城市的特色,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鹤坪的出现,是一道亮色。他的根在座城市,几十年来自己又在这个城里沉沉浮浮,饱尝了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他首先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角色为生存而奋斗着,然后是小说家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的小说有真正的人的东西在里边,有生活的原汁原味,或许,他的叙述语言对于外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障碍,而西安市人读起来却受用不已。依我的观点,也同意他以后在语言上做一些筛选和提炼,却更希望在时下让他尽最大的力量发挥西安土语的特点,先用加法,后用减法,保持浑厚和鲜活,以求往后的大的气象。

描写出了一个地方,抑或一个城市的味道,这并不等于作品的价值走向,而在于为了获得这种味道所摹写的琐碎的生活能传达出一种诗意,使整个作品能升腾起来。鹤坪在《大窑门》里,我们就可以嫌其不足,但到了这本《俗门俗事》,既有现实,更有精神,令我们感到欣喜,而使文坛关注了他,对他寄予大的希望。

与鹤坪已经相识了数十年,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十足聪明,悟性极高,但往往乏于忍耐,反复无常。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使更大的作品出现。西安需要他,文坛需要他。

□贾平凹

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

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

□鹤 坪

把小说写成“满汉全席”;吃腻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的当代读者,真需要通过“吃素”,进入文学体态“增格调”与“减赘肉”境界。

说到吃素,讲究大了,比写小说讲究。吃素的人的心门打开了,直通窍道,能听到雪的声音和土地的呼吸,吃素并不古奥,吃到妙处新妍竞放、晶光迸溅。

往直白里说,小说的根在民间俗世那里,写出的只能是平易简淡的俗世事、浮沉浪事、油盐琐事。讲出的花招花活、雅俗孰俗那是小说家个人的事情。

过去说书的、唱太平鼓的、打着小锣“说前朝的”,甚至举着牛膀骨“说莲花落”的、打着竹板儿“报升平”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最宜“小猫吃小鱼”,小说也可以是“小胡同里赶猪”,但小说绝不是“盲人摸大象”。还是鲁迅说得好: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是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

小说家本分了,必然带动整个阅读界的“清静”与“归心”。并且巨大地增容当代文学的尊严和激活读者对“欧风美雨”以及之后的“日蚀韩侵”的抵御!

写到这儿,我躬身而起,给小说和小说家这个“小”字脱帽致敬!

小说家不是历史的“书记官”,也不是时代的“秘书”,小说家就是一种中国文人的生存手艺;小说哩,就是熔铸传奇、杂学与语言的“手艺活”。别把小说家“支”太高,也别把小说“架”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肉架子”上做烤串。小说轰动了,算你命里有,你可以喟着红烧肘子作种“如是说”;小说放了“哑炮”,算你点儿背。当然你也可以举着牙签肉把玩其间的“柔可绕指”与“余音绕梁”!

过去商街草市的买卖讲究要有个利益市的“吆号”,所谓吆号,其实就是醒目的字号招牌。“长发祥”是绸缎庄的吆号,“德茂恭”是糕点坊的吆号,“房打颤”是房屋牙狎客(也就是房屋中介)的吆号,“日升昌”是钱庄的吆号。最属“皮匠作坊”门前的吆号稀奇,没词,皮匠作坊门前就挂窄窄两绺

风干了的牛皮和一根被岁月磨砺得油光水滑的“牛宝”(牛鞭)。据老辈子说,牛鞭这玩意儿避邪。你不信我信。

皮匠人老八辈都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子,门首的招牌匾额再招摇、再有词采也白搭。这两绺子风干了的牛皮和那根梆梆硬的牛宝就是吆喝,有风叮咣响、无风响叮咣。这就是城乡百姓对皮匠铺子约定俗成的认知,但它就是百姓对皮匠铺子的图符记忆。中国人对“约定”有着发自心底的虔诚,而“俗成”之后的皮匠铺子的“幌子”似乎更忠于主子,给了那两绺干巴牛皮一个足够响亮的吆号:皮干板儿!

是先有“皮匠铺子”还是先有“皮干板儿”,今考。

“皮干”二字在西安土语里明里暗里都意指:杂话连篇、语含讥讽、话锋咸酸的说话方式,其间不乏对“皮干”者没有尊严的前提设置。而“板儿”指的是爱“皮干”的人手上的道具,可以是快板儿,也可以是“皮干”的事情。

约定俗成和入乡随俗,应该算小说家的双脚。“约定”显然有“契约”作用,而“俗成”明显具有传承意义。往实处说,不论书房还是草市,“契约精神”都属华夏子孙优秀优良的“私德”和“公德”结构出的共同遵行的生存原则;纵是勾栏、“宝场”(赌馆)它也务必尊崇“嫖情赌义”这个约定俗成的行当讲究。

小说家的“契约精神”是和谁制订呢?当然是和读者,而不是衙门。

在我的心底里,读者就是我的爷,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地。

说起皮干板儿,学问大了。衙门的役吏杂差有世代相传的杖责拷打罪囚的刑具讲究,有《狱吏谣》说:外伤五花棍,内伤皮干板儿。另,关中道上的吆车把式尤其讲究要拥有一根能甩得出炸鞭一样脆响响声音的用“皮干板儿”拧成的马鞭子。而那根“皮鞭棍”(牛鞭)早就让城里的郎中写进了药方,并且让红馆馆子的大厨请进厨房,有了新的名称“钱肉”。“钱肉”的烹饪技艺已经基本失传,但小说家大可扯开性情壮美“钱

肉”的滋味: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钱肉!

所以,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小说家都得先找到“皮干板儿”。皮干板儿可能是个腰缠万贯的土豪,也可能就是个腰扎草绳的苦讨,但他煮不熟、炖不烂的那股子筋头巴脑的顽皮劲儿,却凝聚着对这个地方的风物土俗及其精神气质的深层蕴藏。

我想,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也就说清楚了小说家的职能和妙用。再往细处说,那就是腌酸菜、炒葱花和皮干板儿所潜隐的对生活的启示和警醒了。

小说是病还是药,这得问小说家。在传统中国文坛那儿,卜赌同源,药毒一家。

逢事都得辩证,读书也不例外。

十字街头,货分东西,人走南北,顶盘挑架的,箍瓮捏笼的,全都是人生,全都有传说。医家有“医不自治”的祖训,松肩拿背的也都有“给后人留口饭吃”的讲究。小说家也似乎有应当遵行的规矩。在“行当祖训”有“医政同理”的说法,但小说家不敢说这话,小说家不是背着个“小”字在讨生活吗?!

小说之“说”,名堂大了。惊堂木一响,说书匠一字一板地说:说书人的口那是无量的斗!

或者“无量”到无限,抑或“无量”到虚无。总之,让小说家承载“高台教化”,那是依靠狗拉大车,只能把大车拉到炕洞里去;抑或把小说往“娱乐”和“消费”归类,插科打诨,搞笑搞闹,耍牙要嘴,那样又明显委屈了小说。

再次向小说鞠躬,这回是为小说之“说”致敬。

话必关心方传远,语必入俗始动人。

俗门打开了,俗人俗事弓马娴熟地朝外面在走。

天目可鉴,芸芸众生中最苦焦的是小说家,因为小说家从皮面到里子都是一门经心灵、接地气的“关心术”:于心交往,不谋利市,难免居贫清贫,难免寒酸艰辛。小说载道,而道不远人。我以为“饱吹饿唱”才是小说艺术的正道。

努力写出乡村变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评阿慈兰若《复活的世界》 □张维阳 孟繁华

一段时间以来,反映和表现乡村变革的长篇小说逐渐多了起来。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我们的文学传统有关,一方面与三十多年来乡村变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关。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极大地激发了作家追逐和表现现实的热情。但是,如何文学化地表现乡村生活的变化,如何使表现当下的现实生活更具有历史感或历史眼光,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阿慈兰若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保持了持续的关注,他的《复活的世界》,以两卷近90万字的篇幅,展现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新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他以西北典型的村庄大营村和猪圈沟为样本,对其进行深入的观测与剖析,将笔触深入农村生活的细部,通过费家、韦家、郑家、罗家等几个家族两代人的恩怨和经历,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与现状的整体性感知,也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具体的蜕变历程。阿慈兰若的严肃与冷静决定了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也显示出中国农村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充满了曲折和困难。

《复活的世界》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容量,涉及到众多的与当代农村相关的话题,从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到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的经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展露和揭示表现出作者对于农村问题的关切和在行。当然,这些内容主要作为一种布景,阿慈兰若最关心的是当代农民的精神状况,改革开放所设定的现代性方案,给当代农民带来了哪些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他们如何突破思想的禁锢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何校正私欲的膨胀所带来的精神迷失,这是阿慈兰若所关心和言说的核心话题。

阿慈兰若敏锐地感受到乡土社会传统价值



观念的瓦解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渗透和冲击。在小说中,费彩花等农村妇女受人指使与怂恿,在大营村大肆宣扬洋教。他们对

宗教的歧见使她们对它种信仰持一种对抗的姿态,不信仰洋教的人就被他们认作是敌人。他们极端的行为貌似出于对信仰的忠诚,而事实上,他们相信极端的行动会让他们得到丰厚的物质回报,物质的诱惑让他们轻易地背弃了传统,他们打着信仰的幌子做交易。在启蒙知识分子眼中,乡土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对于祖先与传统的崇尚和畏惧是束缚农民心灵的枷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现代性发展道路上的大步迈进使中国农民的心灵逐渐松绑,古老的价值体系随之土崩瓦解。然而,新的价值观念在有效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同时,也使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真空地带。在否定了对祖先和神灵等权威的敬畏之后,何以束缚人性中的贪婪?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现代性难题,在中国这个宗教传统相对薄弱的国家,这个问题无疑更为突出。阿慈兰若通过对具体的乡土生活的展示,揭露了这个异常严峻又无比重要的问题,同时表达了他对此的担忧。

阿慈兰若不仅关心乡土世界的价值体系,也关心当下农民的精神追求。改革开放不但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让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的权利。经过电视、杂志等媒体的描绘和渲染,城市里物质的充裕和生活的丰富对农民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城市满足了农村青年对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全部想象。对那些有胆识、有能力、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的农村青年

来说,告别土地,投入城市的怀抱,似乎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些躁动的青年进入城市,在接受现代洗礼的同时,能否秉持良知和操守,追求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在目睹城市喧嚣和浮华后,他们是否会被城市的浊流所吞噬,陷入迷失和堕落的危局?这又成了阿慈兰若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彭水田是作品中带领大营村发展致富的领路人,曾经的他质朴而勤劳,通过在城市辛勤的劳动和勇敢的闯荡获得了村民的赞誉和信赖,被乡亲们选为村长